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4.05.011

论汪毅夫先生闽台民间信仰研究的特色

庄恒恺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8)

摘要: 民间信仰是汪毅夫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考察他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可以发现其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富有理论创见、运用多学科视角、注重现实关照。

关键词: 民间信仰;汪毅夫;福建;台湾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5-0464-04

On Professor Wang Yifu's research features in popular beliefs both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aiwan region

Zhuang Hengkai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Popular belief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fessor Wang Yifu's academic researches. By studying his achievements in popular beliefs both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aiwan region, the main features of his researches are revealed: originality, view of multi-discipline and emphasis on reality.

Keywords: popular belief; Wang Yifu; Fujian; Taiwan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汪毅夫先生的治学重心逐渐由中国现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转向闽台区域历史与文化。二十多年来,他共完成了二百万多字的学术著作,在闽台地方史、闽台关系史、地域人群、地方文献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间信仰也是汪先生所重视的学术选题,他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的努力,受到学界的瞩目。

汪毅夫先生关于闽台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一本专著和十九篇论文。专著题为《客家民间信仰》,先是作为“客家文化丛书”的一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台湾水牛出版社在岛内出版。论文包括:《论台湾民间信仰的普化现象》《试论闽台雉文化的共同性》《略谈台湾民间的冥婚之俗》《台湾民间巫术信仰丛谈》(以上收入《台湾社会与文化》);《随意随俗的走向与闽台

民间信仰的共同进步》《闽台民间的广泽尊王信仰》《“船仔妈”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闽台民间的吕祖传说和吕祖信仰》《闽台雉祭丛谈》《金门: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录与民间信仰的特异情节》《南平樟湖集镇的民间信仰》(以上收入《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泉州民间的通远王信仰》《“崇德报功”与妈祖信仰的双翼结构》《“闽人佞鬼风俗”之分析》《签卜的文化观察》《雉:游戏与舞蹈》(以上收入《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流动的庙宇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以上收入《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先后收入《闽台地方史研究》和《闽台妇女史研究》)。此外,他在与学界同行合著的《金门史稿》中辟有专章(第九章)论述金门的民间信仰,在《窗口随想录》《台湾竹枝词风物记》等论文中亦论及台湾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 2014-05-06

基金项目: 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4213)

作者简介: 庄恒恺(1983-),男(汉),山东烟台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闽台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史。

作品所反映的民间信仰现象。

通过考察汪先生闽台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其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富有理论创见

在研究闽台民间信仰时，汪毅夫先生重视对民间信仰现象的论说，注意考察神祇的流变，这构成了他研究工作的基础。但他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深入追寻现象背后的本质，发掘闽台民间信仰的特征，提出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创见。

首先，提出了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理论。汪先生曾论：“从信民对神明的态度来考察，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相比照，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一般说来，信民的主要期望乃在于‘现世现报’和‘有求必应’（如所谓‘祈福赐福’‘求子得子’‘有烧香有保佑’），而不在乎‘来生幸福’或‘死后升入天堂’。常见有论者据此特点认定民间信仰‘灵验本位’和实用实利的取向，对民间信仰的道德取向却毫无认知”^{[1]162}。有鉴于此，他通过对妈祖、广泽尊王等神祇升转过程的考察，得出一个崭新的结论：“我们从闽台民间信仰看到的信民造神、信神和祭神三个层面上的实际情况是：信民并非仅仅对神明的灵验传说津津乐道，对神明的美德亦念念不忘，甚至有意编造和编排神明生前乃至死后的美德故事；信民并非仅仅相信神明有实利实用的功效，还服膺‘人神共钦’的美德和‘善有善报’的道理；信民祭神，并非出于‘报其功’，间或也由于‘思其德’。”^{[1]163}在此基础上，汪先生提出了“双翼结构”理论：“美德故事与灵验传说、纪念性祭祀与诉求性祭祀、‘崇德’与‘报功’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2]171}“双翼结构”的提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方认为民间信仰没有祭祀传统，常将其认定为淫祠、淫祀。“双翼结构”理论的提出，为民间信仰信众的祭祀活动找到了观念与行为之源头，使它契合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活动的本义——“崇德”与“报功”。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民间信仰常被等同于迷信，汪先生指出：“纪念性祭祀跟诉求性祭祀是有区别的，不当将它视同迷信。”^{[1]172}这有利于挖掘民间信仰中的积极因素，为认识和处理民间信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此外，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时，常过度强调其工具

性作用，而“双翼结构”对民间信仰中纪念性祭祀、“美德故事”等道德取向的肯定，展现了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其次，对制度化的宗教与世俗化的民间信仰二者关系进行了阐释。民间信仰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汪先生曾经指出：“民间信仰是世俗化的，因而其‘神道设教’之种种说法和做法往往具有拟人化和随意性的特点。”^{[2]156}他并以《林宾日日记》所记“主疹”之神“潘氏夫人”、近人陈鑑修《龙溪新志初稿》所记“水仙姑”故事说明之^{[2]156-157}。与此相对的，是宗教在总体上具有制度化的倾向。同时，汪先生也提出：“宗教制度化、民间信仰世俗化的倾向是总体而言的倾向。在某些具体个案上，宗教不免世俗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亦有制度化的倾向。”^{[2]159}例如，客家住区的定光古佛，以其世俗化程度过限而成为民间信仰的“俗佛”——“定光古佛是客家人为适应山区农耕社会之种种需求（风调雨顺、水源充沛、劳力充足、无灾无祸）而创造出来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不佛不神、亦佛亦神的崇拜对象。”^{[3]162}而保生大帝信仰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接近和接受道教的影响、逐渐趋于制度化^{[2]160-161}。此外，汪先生还注意到了其他类似现象，如《归化县志》《宁化县志》《清流县志》所记寺观内神像、佛像和“亲像”（祖先之像）杂陈、僧道合流、佛教世俗化等情况^{[3]2-4}；又如，在厦门南普陀寺放生池的碑文中有“菩萨降鸾”之语^{[2]241-242}，等等。因此，汪先生认为：“世俗化同制度化异向而非逆向，两种倾向可以发生交叉和互动。”^{[2]161}这一认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第一，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政府管理与服务的对象主要还是五大宗教，对民间信仰的引导与管理还在探索中。在现行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制度化宗教（特别是道教）的功能，解决民间信仰管理中诸如登记等现实问题，满足信众的信仰需要，值得解放思想，深入思考。第二，从宗教生态的角度而言，民间信仰的世俗、本土、功利等特性，满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需要，有利于平衡制度化宗教的发展。在民间信仰发达的地区，少有制度化宗教过度膨胀的情况。

二、运用多学科视角

汪毅夫先生在《台湾社会与文化》《客家民间信仰》两书中都曾谈及中文（国文）系（所）出身的

学者向史学界学者请益的必要性。其实,在文学与历史两个学科之外,他在分析研究对象与阐述观点时,还注意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他在运用多学科视角研究闽台民间信仰的过程中,展现了如下特点。

1. 精于考证。毋庸讳言,在闽台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将传说当作史实,并且陈陈相因。汪先生善于运用考据的方法,纠正了若干错误的说法,并对一些民间信仰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试举数例。例1,他利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确证了明代叶向高的科年,揭穿了一则与九鲤湖鲤仙庙相关的灵验传说^{[3]69-70}。例2,他指出了闽台两位妇婴保护神的异同:“和临水夫人一样,注生娘娘亦是闽、台两地的妇婴保护神。但注生娘娘的‘诞辰’是三月二十日,临水夫人的‘诞辰’为正月十五日。近年常见有民俗学著作将两者混同为一。”^{[4]76}例3,与福建内河水神势力(影响力)的平面划分不同,在闽台海上诸神中,妈祖居于上位。这是为何?汪先生解释道:“福建内河水神势力(影响力)范围的划分有可以标识的自然物为界。在闽台海上,四望唯水,茫无畔岸,水神的势力或影响力所及,无法实现由此及彼的平面划分,却易于形成自上而下的立体谱系。妈祖同水上诸神的关系因河、海而异,其原因盖在于此。”^{[2]150}例4,“通远王”是宋代泉州最为灵著的海神,但在元代以后默默无闻,地位完全被妈祖替代。对于其中原因,汪先生认为:“通远王信仰之兴与衰,其原因乃在于神明传说中的主要功能。……其最被看重的功能乃在于祈风有应。……在航海技术渐次发达,‘机船’、‘火轮’出现以后,通远王最被看重的功能当然渐被看轻,通远王信仰当然亦渐次式微矣。”^{[2]151-152}诚然,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但学术的进步又的确需要这样点滴的工作来推动。

2. 重视田野调查。汪毅夫先生善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书斋和田野都是他治学的好所在。早在闽西客家住区插队务农时,汪先生便开始进行初步的田野工作。他曾记曰:“在将近六年的农耕生活里,我有机会就近观察,从中体察客家文化外在、内在之种种情形。那时,我开始了一些初步的研究:采集口碑资料、查看墓葬碑刻、记录方言词语,还曾就疑难问题写信向当时也在闽西客

家住区居住的蔡厚示先生请教。”^{[3]167}汪先生在后来进行闽台民间信仰研究时仍然重视田野调查。例如,他先后五次到闽西客家住区,访得不少文字和口碑材料^{[3]167},为写作《客家民间信仰》奠定了基础。又如,他在南安等地做田野调查,访得了广泽尊王郭忠福的民间口碑材料^{[5]100},在《闽台民间的广泽尊王信仰》一文的写作中有所体现。再如,他1995年暑期在闽北做田野调查,后写成《南平樟湖集镇的民间信仰》一文。这篇论文记录了蛇王、临水夫人、齐天大圣等当地鲜活的民间信仰现象,从中不难看出民间信仰的若干特点。例1,“三天尊王庙主祀陈公、卢公、铁公三神,陈公为文神,卢公和铁公为武神,其中卢公并且是赌博之神,赌徒常往求之。”^{[5]151}赌徒求神,反映了民间信仰的随意随俗与功利化。例2,“樟湖集镇四周田亩间或有‘潘倪王’的象征物,砌石粗凿而成,状若小屋。据当地居民报告,‘潘倪王’(当地居民读如‘潘儿王’)为三个养蜂人,他们曾放蜂驱寇而立功。在田亩间砌石祭祀,有纪念潘、倪、王三人的意义,又有保护禾苗免受野兽践踏的功用。”^{[5]152}“潘倪王”由人而神的过程,说明了具有美德传说的本土百姓,是民间信仰神祇的重要来源。例3,“樟湖集镇各庙宇几乎都备有‘惊堂鼓’(聚灵庵除备有‘惊堂鼓’外,还有‘惊堂钟’),香客进得庙门,先击鼓五下(也有庙祝代击的做法),焚香祭拜后退出,又击鼓五下。庙门之旁设‘惊堂鼓’,击鼓升堂、击鼓退堂。这使得庙宇多少有了官府衙门的威严。有的庙宇如福庆堂、进兴宫还仿照官府衙门,延‘师爷’入于幕中。”^{[5]154-155}此处所记庙宇设置成官府衙门等情形,反映了民间信仰对社会等级的模仿,是民间信仰世俗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3. 注意边缘史料。汪先生曾言:“以边缘的资料支撑边缘问题研究,思维之光照射着一片朦胧的未知领域,必然催生出前沿的学术成果。”^{[6]63-64}以边缘资料进行研究是汪先生治学的一贯风格。他研究闽台民间信仰的一篇重要论文,题为《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从文题即可看出他选择史料的眼光。在研究中,他特别注意运用地方志、笔记小说、寺观宫庙志、宗教碑铭、日记族谱等边缘史料解决学术问题。例如,在西方汉学界,“淫祀”的定义不下10种^{[7]4}。汪先生则利用福建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南宋宝

祐《仙溪志》，对“淫祀”下了简洁、准确的定义：“（《仙溪志》）所记‘祠庙’均‘载在祀典’，‘其不在祀典者不书’。质言之，‘祠庙’又有‘载在祀典’与‘不在祀典’之分。‘不在祀典’的民间信仰及其活动场所时或被视为‘淫祀’和‘淫祠’。”^{[2]165-166}又如，焚巫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的常见现象，而汪先生通过考察方志和民间口碑材料，找出了三例积薪危坐的雩祭^{[5]135-137}，说明了焚僧祈雨是焚巫祈雨在福建地区的变异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在注意边缘史料的同时，汪先生同样重视古代经典文献和王朝典章制度，并且两相对照，互相发明。

三、注重现实关照

民间信仰是具有现实性的学术问题。福建地区自古有“好巫尚鬼”的传统，民间信仰十分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更呈现出复兴的趋势。据丁荷生的调查与估计，截止1992年，福建全省重修的民间信仰场所达3万座，每个县都有300~1000左右的民间信仰场所被修复^{[8]3-4}。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数据当远多于此。民间信仰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如何正确对待民间信仰问题，关乎社会稳定。汪毅夫先生重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照，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

1. 关于民间信仰的有害因素与有益因素问题。汪先生认为：“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倾向及其‘祀神的混乱’和‘神道设教’的拟人化和随意性的特点并不足诟病。应该受到批评指摘的是它的有害因素，是它的某些不正当的说法和做法，其有益因素则不当牵累及之。”^{[2]163-164}他以闽台两地的“王爷”信仰为例。一方面，“王船祭”（俗称“出海”、“送王船”等）包含了“贻祸于人”的可鄙

意念；另一方面，在台湾云林县的民间传说里，“萧王爷”被赋予“解冤息仇”即社会调解的功能。汪先生的结论是：“显然，我们不应当因为民间信仰的有益因素而容忍民间信仰的有害因素……反之，我们也不能因为民间信仰的有害因素而不容民间信仰的有益因素。”^{[2]164-165}

2. 关于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问题。汪先生考察了宋代福建地方官员捣毁淫祠的四件个案，并记：“自宋代以降，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然而于今视之，当年官方毁淫祠的动作仅收一时之效。”^{[2]166-168}他认为：“历史证明，没有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不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官方毁淫祠的动作往往归于徒劳。”^{[2]168}

3. 关于闽台民间信仰交流的问题。民间信仰在海峡两岸民众交流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汪先生认为，应该利用民间信仰随意随俗的走向来引导民间信仰，在更高水准上推动这种交流。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指出：“近年来闽、台两地在民间信仰层面上的交流呈现为频繁而广泛的情形。我想，利用民间信仰随意随俗的走向来引导闽、台民间信仰上于共同进步之路，这也应当进入交流的节目表。”^{[5]9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所及，只是汪先生闽台民间信仰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研究，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考察，对于诸如闽台傩文化、巫术信仰、雩祭等都有精辟之论。民间信仰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的学术热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汪先生著作中所蕴含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开辟了新的道路，值得学界同人借鉴，值得后辈学子学习。

参考文献：

- [1] 汪毅夫. 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0.
- [2] 汪毅夫. 闽台缘与闽南风[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
- [3] 汪毅夫. 客家民间信仰[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 [4] 汪毅夫. 闽台地方史研究[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 [5] 汪毅夫. 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 [6] 汪毅夫. 客家研究新范式——评刘大可著《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J]. 学术评论, 2013(1): 62-64.
- [7] 康笑菲. 说狐[M]. 姚政志,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8] Dean K. Taoism and popular cults in Southeast Chin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